

關於研究中共軍隊的幾個問題

齊茂吉

一、中共建黨建軍的背景

對於中共而言，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動」以前，中共並沒有本身的軍隊。此後，中共開始了武裝鬥爭的奪權活動，毛澤東即強調說：「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務。」（註一）那麼，中共要建立什麼樣的軍隊？用軍隊來幹什麼呢？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七日至廿九日在北平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中指出：「……由於中國沒有資產階級民主，反動統治階級憑藉武裝力量對人民實行獨裁恐怖統治，革命只能以長期的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中國的武裝鬥爭，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農民是無產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無產階級有可能和必要通過自己的先鋒隊用先進思想、組織性和紀律性來提高農民群眾的覺悟水平，建立農村根據地，長期進行革命戰爭，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註二）

照說，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工人應是革命的主力軍，因為唯有工人的階級覺悟程度最高，革命性也最堅決不移。反之，由於農民與生俱來的小資產階級意識，因此革命立場也不夠堅定，會產生搖擺不定的毛病。換句話說，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念中，認為農民雖然不是反動的，但却是保守的，因為「企圖倒轉歷史的車輪」。（註三）可是在以當時中國的環境及條件，中共要建立一支以工人為主力的武裝力量，來進行奪取政權的活動，顯然是不切實際的。

已故的名學者郭華倫教授即指出說：「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經濟非常落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後，民族工業才有若干發展，可是在列強和軍閥的束縛下，其發

關於研究中共軍隊的幾個問題

展是有限的。而且是以輕工業為主。當然，隨著工業的發展，中國工人階級也逐漸增加，有了中共產生的社會階級（或稱階級基礎），不過，工人的數目還是有限，毛澤東於一九二六年估計：『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約兩百萬人』這是一個估計，而且是誇大的說法。一九一八年據北京農商部的估計，全國工人數共計一七四九三三六人，這是包括若干手工業工人在內的統計，如果除去手工業工人，當時中國無產階級最多不超過一百五十萬人，佔全中國人口百分之零點三七，中共建黨的階級基礎是如何的脆弱便可想而知了。』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工業的發展偏重於輕工業，產業工人在成份上，婦女兒童佔相當的數量，『老工人』的比重極其微弱，大部分是剛由農村流進城市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小資產階級的破落戶，所謂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是不能設想的。因此，中共建黨的所謂思想準備，也是沒有階級意識作為根據的。」（註四）直到中共統治大陸後，據毛澤東透露：『解放以前只有四百萬產業工人』。（註五）顯然，中共建黨的基礎並不是一個工業社會，仍然只是一個農業社會。

基本上，中共建黨的背景就是漢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稱的「西方型革命」。（註六）所謂「西方型革命」指的是，舊王朝崩潰，代之而起的是新社群進入政治圈，並且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可是舊政權崩潰之後，往往就是權威的真空。漢廷頓並指出，舊王朝崩潰之後，假如沒有任何團體已準備好並能夠建立有效的統治，許多派系和社會勢力便爭奪權力。在這種情形下，最強的派系和社會勢力往往就能填補權力的真空，並試圖建立權威。當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一役推翻滿清政權後，由於革命勢力仍無法有效統治全國，革命的成果乃為袁世凱所攫奪，然袁世凱試圖重新復辟專制帝制不果，遂演成北洋軍閥割據之局。迄至蔣中正總司令率領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全國雖告統一，然中共已在蘇聯的扶植下密謀奪權。

據雷海宗的研究，「在一盤散沙的社會狀態下，比較有組織的團體，無論組織如何微弱或人數如何稀少，都可操縱一般潛極頹靡的國民。中國社會自漢以下只有兩種比較強大的組織，就是士大夫與流氓。」但士大夫有他們特殊的弱點。以每個份子而論，他們都是些文弱書生，兵戎之事全不了解，絕對不肯當兵，太平盛世他們可靠皇帝與團體間無形的組織維持自己的勢力。天下大亂，他們就失去自立自強的能力，大權就移到流氓的手中。」至於流氓團體則與士大夫同時產生，「戰國時代除遊說之士外，還有游俠之士。他們肯為知己的人捨身賣命，多為無賴遊民出身，到漢代皇帝制度成立後，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俠士太公開的自由行動大致剷除。但這種風氣始終沒有消滅，每逢

亂世必定抬頭。由東漢起遊民也有了組織，就是宗教集團，最早的例就是黃巾賊。鬆散的人民除對家族外，很少有團結的能力。只有利用宗教的迷信與神秘的儀式才能使民衆團結。由東漢時代起，歷代末世都有類似黃巾賊的團體出現。……明代歷批的流寇仍多假借白蓮教或其他邪教的名義。滿清末季的白蓮教、天理教、八卦教以及義和團都是這類的流氓、愚民，與餓民的團體。流氓是基本份子，少數愚民被利用，最後餓民大批入教。」不過，「流氓團體也有它的弱點。內中的份子幾乎都是毫無知識的人，難成大事。」由於知識份子和流氓均有其缺點，因此每逢亂世，不論是知識份子或者是流氓均難成大事。「……但一二流氓的頭目因老於世故，知人善任，於大亂期間或能成偉人，甚至創造帝業。漢高祖與明太祖是歷史上有名的這類成功人物。但這到底是例外，而且他們成事最少一部分須靠士大夫的幫助……」。（註七）

雖然，中共建黨的初期活動，知識份子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不過，這批知識份子對於馬克思主義並沒有進行系統的深入研究。「當時的『中國青年』雜誌曾指出：『要在中國現在的出版物中去研究馬克思學說，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漫說他底卷帙浩繁的『資本論』，就是他底小冊子如『經濟學』批判之類也沒有譯本可看。』這就直接影響到當時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普遍不高。建黨時期的一些參加者回顧這個時期的情況談到：「『當時我們對於馬克思主義知識是太少了。我們多數同志幾乎是當了共產黨才學習馬列主義。』」（註八）顯然，中共建黨初期，這批知識份子是革命的狂熱多於理論的了解。「李達同志在一篇回憶中曾說：『黨的幼年時期，多數同志幻想著中國革命可以由全國工人總罷工來實現。』」（註九）以中共建黨之初的湖南地區為例，毛澤東回憶說：「在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省委——我當時是書記——已經在礦工、鐵路工人、市政職工、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幣廠工人中組織了二十多個工會。那年冬天，開展了蓬蓬勃勃的工人運動。當時共產黨的主要工作主要集中在學生和工人身上，在農民中間則做得非常少。大部分大礦的工人已經組織起來，學生也幾乎全部組織了起來。」（註十）

雖然，自中共建黨以來，一直試圖在城市組織產業工人和激進學生，發動城市暴動來奪取政權，結果都遭到慘敗的命運。在這種缺乏階級意識的產業工人作為「革命」主力的情況下，廣大的農村不僅有取之不竭的兵源，而且也可以作為「革命」的根據地。龔楚在其回憶錄中亦指出：「我認為：農民在數量上佔全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至現時各階層各業的人中包括工人在內，也多是農民出身，因此，中國革命必須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與參加，才有成功的希望，這是無可否認的鐵一般的事實。無論你是國

關於研究中共軍隊的幾個問題

民黨或是共產黨，不管你是民族革命、民主革命、民權革命或是無產階級革命，都不能脫離這一巨大無比的農民力量。」（註十一）

至於日後以農民運動起家的毛澤東，其實當初對農民甚為歧視，毛曾坦承說：「我從前做學生時，回鄉時看見農民反對『洋學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習』一鼻孔出氣，站在洋學堂的利益上面，總覺得農民未免有些不對。」（註十二）「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份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註十三）直到一九二六年到二七年間，毛澤東才明顯地改變了二〇年代初期對於農民的一種傳統上比較不信任的態度，並對農民的革命潛力給予極高度的狂熱評價。（註十四）此後，毛澤東開始密切注意中國農村的問題，「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農村裡階級鬥爭的程度，但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以後，以及在繼之而起的政治運動的巨浪中，湖南農民變得非常有戰鬥性。」於是，「我在湖南觀察了長沙、醴陵、湘津、衡山、湘鄉五個縣的農民組織和政治情況，並向中央委員會提出了報告，主張在農民運動中採取一條新的路線。」（註十五）根據實地調查，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因為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自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毛認為：「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這個貧農大群眾，合共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毛強調：「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因此，毛主席：「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中共為了奪取政權，就必須「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註十六）日後，毛澤東又強調說：「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動力。」（註十七）事實上，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動」後，中共才開始在江西、湖南和福建的窮鄉僻壤建立起武裝基地，鼓動農民參加紅軍，這也是毛澤東在中共黨內崛起的背景。漢廷頓曾指出：「在大部分現代化中的國家，由於農民是最大的社會勢力，最成功的革命領袖應是那些動員並組織農民參與政治活動的人。」（註十八）而毛澤東正是以農民運動起家的典型者。毛澤東

能在中共黨內逐漸嶄露頭角，因為毛有流氓無產者的氣息，又是個半吊子的知識份子。換句話說，毛澤東具有知識份子和流氓的雙重性格，這也是中共建黨後幾個「書生理」的領導者，如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及陳紹禹等人，不知毛澤東的地方，這種特性是毛後來在中共黨內成爲最高領袖的不可忽視的條件。

由中共建黨後到稱兵奪權的初期活動，與雷海宗研究中國歷史的演變，實不無相同之處。一批知識份子和流氓無產者的結合，試圖建立一個布爾什維克式的政黨，雖以共產主義爲招牌，然對理論的了解毋寧說是一種宗教式的迷信，並用來鼓動農民參加武裝暴動，這正是中國歷史上流寇運動的翻版，就其本質而言仍不脫中國歷史上農民戰爭的範疇。

根據中國歷史演變的經驗，每當農村經濟產生危機之際，就會醞釀流寇式的農民暴動，甚至發展爲大規模的農民戰爭。據翁之鏞的研究指出：「當人口少而土地多的時代，土地的生產足以供人口的消費，且富有繼續供給的彈性，就是治世，治世且也能較爲久長。一到人口增加已達飽和點，或超過了土地負擔能力之外時，即使未即會成大亂，也將醞釀亂源而變久亂。」（註十九）在由治轉亂的關鍵時期，也就是農村經濟開始產生危機的時候，蔡雲村指出：「所有引起農村經濟危機和加重農民痛苦的淵源，其最重要者便是土地集中與農民的破產。」（註二〇）由於，「土地成了商品，集中便是必然的發展。」（註廿一）結果，「失去土地的農民只有貧困流亡，佔有土地的地主又是繼續日積月累。」（註廿二）這種轉變的特徵也就是土地所有權與土地使用權成了反比的現象，換句話說，土地所有是日益集中，土地使用却是日益分散。結果，地主壟斷了土地的所有，反之，破產的農民唯有出售土地維生，而淪爲佃農或流民，而農村中也遂形成兩極分化的現象。這種情況，馬扎亞爾指出有四點特色：一在地主、商人、紳士、軍官、高利貸者，富農手中的土地私有的集中過程，比較迅速。二在富農的鄉村中土地使用的集中過程之遲緩。富農土地私有的集中，時常並不能造成土地使用的集中，因爲富農要將土地出租出去。三小農私有者轉變爲佃農的過程的相對迅速。四小土地私有者如小經濟之土地使用分散過程迅速。（註廿三）此一時期農村經濟危機也開始惡化，破產的農民原本的「安土重遷，留戀鄉里」的保守思想，也隨之轉變，而逐漸產生一種流浪冒險的激進思想，結果也就肇致流寇式的農民暴動。

龔楚在其回憶錄中，對於當時的中國農村如此描述：「農民耕種著地主的土地，每年要將土地收益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繳納給地主作地租。每逢節日還要送禮孝

關於研究中共軍隊的幾個問題

敬地主，有時還需無條件爲地主義務勞動。許多刻薄的地主常利用他們剩餘的糧食和金錢，在青黃不接的夏荒時候，將糧食或相等於糧食價值的金錢，作爲高利貸放給農民。最普通的是在夏荒時借一擔（一百斤）穀子，秋收後即要還一擔半（一百五十斤），僅三四個月的時間，利息就等於貸金的百分之五十。」「有些有田契或地契作抵押的貸款，年息亦達百分之三十六以上。秋收後所得的穀物，除了繳付地租和利息外，便所剩無幾了。」「農村中流行著一首民歌：『農民收了穀，家中無粒粟，田主家裡堆滿屋！』這首充滿辛酸血淚的歌詞，正是當年中國農村社會的最好寫照。」（註廿四）因此，農民運動也就成爲中共武裝鬥爭時期的重點，而土地問題也就成爲農民運動的中心。龔楚指出：「二十世紀的上半世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是以『土地革命』爲其主要內容；而以佔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爲革命隊伍的主力軍。這是自一九二七年以來一直到中共統治了大陸所經過的事實所證明了的。」「關於這個中國革命問題中的主要問題——土地革命和農民問題，看得最重要，認識得最清楚的就是毛澤東。我們可從他一九二七年三月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及以後來革命鬥爭的實踐過程可以看出來。我們可以說：毛澤東之所以能夠成爲這一革命階段的領袖以及所以能夠奪取中國政權，也就是能夠把握著這個主要問題所致……。」（註廿五）

必須指出的是，當時國民政府並無機會在農村中實行和平、溫和的土地改革政策，而使中共趁虛而入，以「打土豪，分田地」爲號召，鼓動破產的農民參加紅軍，並以平等主義的精神來鞏固紅軍內部的團結，來激發「革命」的鬥志。毛澤東即指出說：「我們同農民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使戰士們感到我們不是一個特殊階層。我們調查農村階級關係，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把土地分給農民。」（註廿六）毛澤東特別強調：「單單爲了土地，中國大多數農民就會戰鬥到底。」（註廿七）事實上，紅軍根本就是慷他人之慨，將以暴力流血的方式攫奪來的土地，分發給破產的農民，而使這批農民產生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爲中共是解放者。所以，江西五次圍剿雖將紅軍逐出其根據地，但是支持紅軍的農村基礎却仍然存在，「江西人民僅得國民黨的回來，也就意味著地主的回來。」（註廿八）因此，流竄至陝北的紅軍乃告再度坐大，而最後竟演成大陸沉淪的歷史悲劇。

二、中共軍隊與農民運動

基本上，自中共建軍以來，主要就是利用農民運動，一方面鼓動農民參加紅軍，而

獲得充分的兵源；另一方面在農村中建立起武裝基地，不斷地擴大其政治影響力。迄至一九四五年五月間，劉少奇在「七大」上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報告時亦強調：「…中國現在的革命，實質上就是農民革命。」此外，劉也指出：「…黨員的絕大多數，是出身於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工人成份很少……」（註廿九）由此可見，中共的黨和軍隊主要成份就是農民。可是領導中共這個黨的高層成員並非是農民。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在高層方面，也就是「中央委員會」之內，百分之九十九是出身於城市且具有混合城鄉雙重特色者（mixed rural-urban）。所謂混合城鄉雙重特色者指的是，具有農民背景（peasant background）的出身者，但並不是實際從事農業者，可能是世代居於農村，或是其父輩是農民，這些人出身於農村，却在城市中受教育，並且從未打算以農為業，這些人具有雙重經驗（dual experience），而在中共黨內別具特色，毛澤東即是具有混合城鄉雙重特色者。在中層方面，也就是地委級至縣委級這個階層，有百分之七十五是出身於城市或混合城鄉雙重特色者。至於在基層方面，也就是各個鄉村的階層，只有百分之五是出身於城市或混合城鄉雙重特色者。雖然，中共黨的基礎是農民，可是縣委級以上的領導階層絕大部份不是農民，而是出身於城市或具有混合城鄉雙重特色者（註三〇）

伊薩克思（Harold Issacs）認為，中共試圖建立一個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却變成一個農民黨。（註卅一）照說，農民黨應代表農民的利益，澈底解決農民的問題。那麼以農民為基礎的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之後，所建立的政權，應該是農民政權，事實上却不然。「…我們要確定這一新興的朝代是否為農民的政權，不能單純依據事變的動力及其經過，也不能依據勝利的領袖之出身如何，而是要分析這一新興的政權對農村的一切設施是否能代表農民的切身利益，是否已經解決了所以產生暴動的一切根本問題。」（註卅二）雖然，中共建立政權的初期曾實行「土地改革」運動，「使佔農業人口百分之六、七十的農民獲得了不同轉變的經濟利益，連同老解放區在內，約有三億二千萬農民獲得了七億四千萬的土地和其他農業生產資料。」（註卅三）但是，經過「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到「三面紅旗」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全中國大陸的土地又再收歸公有。結果，黨以另一種形式的佔有而成為新的地主，而全中國大陸的農民俱又成為僱傭的佃農，其境遇比一九四九年之前還要惡劣。（註卅四）在三〇年代時期，蔡雲村即已斷言：「『農民政權』這件事，古今中外從來未曾出現過，並且根本就是不實現的。」蔡指出：「中國歷史朝代的變換往往起於農民，但終於為富農小地

關於研究中共軍隊的幾個問題

主以及商人所利用去創立新的剝削農民的政權。」至於，「政府對農民的改良政策乃是『天下未定』，恐怕農民復揭竿而已。因此不得已對農民讓步，而非為農民的階級利益的。」（註卅五）日後的形勢演變證明，當初中共對農民採取的懷柔手段，主要就是利用「土改」先行穩定農村的不安，俟統治力量足以控制全面時，又再利用社會主義化的名義，對土地施行新的形式的佔有，而形成土地的全面集中，農民的利益又被置諸一旁，中共乃蛻變為剝削農民的政權，翁之鑄即指出：「綜觀二千年來，朝代的變易，和每一朝代動亂的起伏，考其起因，自然多少利用農民不滿現實的怨望，和對不當統治的反抗情緒，才會被愚弄而裹脅，引起騷亂，祇有這種騷亂才會在極短時間很快的蔓延開來。……如其由農民暴動開始的騷亂積漸變質，作了野心家割據稱雄的工具，農民即墮入痛苦的深淵而無力自拔，僥倖的在中原逐鹿不久就定於一尊，重享太平；不幸的相持於對峙之局，不特及身在喪亂中度生，且將貽禍患於子孫。無論騷亂在何種情況之下結束，農民總是一個被犧牲者。倘小亂平息以後，原來統治者必有一番鎮壓措施，更難免株連而受不白之冤。倘在相持局面之下，更是徵斂繁興，剝削此時俱增，祇有飢荒與貧困為緣，甚或還要遭到家破室亡妻離子散的劫運，與死亡為鄰。倘舊統治者崩潰新統治者代興，農民還祇不過是一農民，仍被壓迫，與前一時代毫無不同。……農民仍舊祇有安份守己，力耕供上，是其唯一的本務；苟能安居樂業，少受壓榨已算無上榮幸。不過全部歷史中碰到這種機會實在太少；就是治世，也不見得完全達到這種境地。所以農民在中國歷史的治平之世，仍然難免遭逢不當的剝削；一到亂離之時，更常有無情的裹脅。不論統治者或反統治者，無一不以農民為其工具，供其犧牲。」（註卅六）龔楚亦感嘆的說：「我參加革命的志趣，是希望能創造一個幸福美好的社會，在當時社會存在的各種不合理的現象，更支持了我的思想繼續發展，可是，在這幾年的鬥爭過程中，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革命時，農民向地主豪紳的激烈清算；和地主豪紳伺機向農民的慘酷報復，在循環不已的鬥爭中，既違背了人道主義的精神，也沒有增進社會人類的幸福，反而使生產萎縮，農村經濟破產，人民固有的生活方式破壞了，新的生活根本沒有建立起來，人與人之間彼此防範，除了聽從中共的命令之外，簡直變成了一個奴隸社會。人性毀滅了，人道毀滅了，人格也毀滅了，自由平等，更談不到。這樣的革命手段，難道是我所應追求的理想嗎？這些問題，使我感到無限的困惑和煩擾。」

「同時，我更想到我們的紅軍，是共產革命的武裝，它的任務是要以戰爭來消滅敵人的軍事力量，以推翻舊的統治，建立蘇維埃政權，但是在不斷的戰爭中，戰死沙場的，並

不是高級統治者的本身，而是破了產的工農貧苦大眾的士兵和中下級的軍官。戰爭的結果，還不是貧苦工農的自相殘殺嗎？」（註卅七）

歸納起來，雖然中共以農民為基礎力量，而建立一支典型的農民軍隊；但是中共的黨却不是真正代表農民利益的黨，而中共黨的領導階層絕大部分也不是農民，迄至中共統治大陸後所建立的政權，更不是農民政權。史瓦滋（Benjamin I. Schwartz）指出，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既不符合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意義，也不符合馬列主義的「農民黨」的意義，而毛只是一個職業革命家的精英份子，利用農民的不滿為動力，而獲得本身的權力。（註卅八）的確，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毛澤東搞的只是一個披上共產主義外衣的農民運動而已，王希哲指出說：「……必須看到的是，毛澤東勝利地領導的這一次革命，不過是一次農民革命。雖然它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但就其內容來說，它沒有超出農民革命的範疇。毛澤東推翻了一個地主政權，但推翻一個地主政權是農民也能夠辦得到的。朱元璋辦到了，李自成辦到了，洪秀全也差點辦到了。而井崗山的道路也不是什麼大大的創造，透過大小五井的山峰，我們可以看到梁山泊水寨的影子。毛澤東這個書生比那些教條主義優越的地方就在於梁山泊聚義的道路比彼得堡起義的道路對他有著更深刻的印象。如果我們只是把毛澤東作為一個農民領袖來考察，那麼我們就沒有什麼可以責備他的。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空前絕後的農民領袖，他之所以後來成為中國的帝王，完全是農民領袖的階級必然性造成的，這是沒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註卅九）

顯然，若由歷史的角度來看中共稱兵起家的背景，中共就是利用農民運動，進而統治全中國大陸，固恩來也明白地指出說：「人民解放軍在作戰中不是孤立的。在三年人民戰爭的高潮中，兩萬萬農民是最偉大的支持力量。一萬萬以上的農民進行了土地改革的鬥爭，分得了土地，另外一萬萬以上的農民正在準備著解決土地問題。在不久的將來，又會有兩萬萬的農民將要進入到土地改革的浪潮中來。這在農業的中國是一件翻天覆地的事情。在土地改革的基礎上，偉大的中國農民貢獻給戰爭的是些什麼呢？他們把他們的子弟，他們的丈夫送給人民解放戰爭，他們把生產節約的糧食供給我們的前方後方，他們當民兵、當民工，不但在後方維持秩序，並且大批地隨著部隊出發到前線去作種種協助戰爭的工作，只要那個地方的戰爭過去之後，那個地方就掀起了生產熱潮。同志們，朋友們，我們依靠了偉大、勤勞、勇敢的中國農民，這才有今天的勝利。我們應當感謝偉大的中國農民……」（註四〇）

關於研究中共軍隊的幾個問題

雖然，中共的軍隊是典型的農民軍隊，但是，若以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軍隊相比，則有顯著的不同。必須指出的是，中共建軍初期的軍隊，無疑帶有濃厚的流寇主義色彩，可以說是一支流寇型的農民軍隊。毛澤東亦承認說：「由於紅軍中游民成份佔了很大的數量和全國特別是南方各省有廣大游民群眾的存在，就在紅軍中產生了流寇主義的政治思想。」（註四十一）這些游民無產者，主要指的就是失掉土地的破產農民。當時，毛澤東指出紅軍內的流寇主義思想如下：「這種思想表現在：一不願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建立人民群眾的政權，並由此來擴大政治影響，而只想用流動游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二擴大紅軍，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衛隊、地方紅軍到擴大主力紅軍的路線，而要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路線。三不耐煩和群眾在一塊作艱苦的鬥爭，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註四十二）可是經過「三灣改編」、「古田會議」以來，中共軍隊乃逐漸由一支流寇型的農民軍隊轉變為執行多重功能性任務的政治化軍隊，此時中共軍隊的特色有三：（一）建立黨對軍隊的領導與控制的制度。（二）建立鞏固的武裝根據地。（三）建立軍隊執行非軍事任務的原則。雖然，紅軍的兵源仍以農民為主，仍是一支典型的農民軍隊，然與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軍隊比較，那就是中共將軍隊置於黨的領導之下，並對軍隊施加澈底的政治訓練，賦予高度的政治性任務，並且加以嚴密的政治控制。換句話說，中共試圖將軍隊意識形態化，以便產生「為誰打仗，為何打仗」的「革命」意識，進而達到奪取政權，鞏固政權的目的。甚至，中共也試圖將軍隊用為塑造意識形態的工具，以達到「革命」目標，這是中共軍隊與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軍隊截然不同的地方。

三、中共軍隊的基本特色

到了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即面臨一個建軍問題，那就是要建立什麼軍隊？把軍隊用來作什麼？準備打什麼戰爭？在這種情況下，自然就有不同的建軍政策主張。問題是，不同的建軍政策主張是否形成了所謂「無階級軍事路線」與「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對立呢？而什麼是無階級軍事路線？什麼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

必須指出的是，迄今產生所謂社會主義革命的地區，都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所稱的高度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互矛盾的條件，以第一個共產政權——蘇聯為例，當時沙俄的資本主義生產力遠比西歐先進國家落後，更遑論以農民運動起家的中共政權。「毛澤東後來經常大喊大叫：中國出現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其實這完全是杜撰的。因為在中國這古老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基礎上不可能自發地產生

資本主義。不僅資本主義從未建立過，就是封建主義同歐洲的封建社會來相比也不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可以在歐洲那些典型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內部自發產生和成熟起來，然後很必然地以資產階級革命來完成生產方式的根本改變，轉為典型的資本主義社會。而在中國却不然，這種亞細亞生產方式內部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係的變革都是極為緩慢的。只因外因，即帝國主義的侵略才促使了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生了一定的變化，使中國進入解放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但是從未曾建立過真正的資本主義社會，而客觀上還根本未曾建立過的東西，怎麼能談得上什麼復辟？」（註四十三）顯然，中共在統治大陸之前，並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社會的階段，那麼又如何會產生復辟資本主義的「走資派」來推動一條資產階級路線呢？關於這個關鍵問題，在理論上毛澤東很關自圓其說。

嚴格來說，所謂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若指涉的是西方英美這些國家的話，其政軍關係和文武集團的關係已發展為一種穩定又平衡的制度化關係，最大的特色就是文人政治的至高無上，和軍方的政治中立，而使軍方干政的危險性降至最低。換句話說，西方著重在提高軍隊的專業主義精神，並在文武集團間分配政治權力，來劃分政軍間不同的領域，以助長職業軍官團產生專業態度與行為，使軍隊軍事化，並使軍隊成為國家的工具，以達到以政領軍的目的。漢庭頓稱之為「客觀性的以政領軍」（objective civilian control）。（註四十四）基本上，在西方，主要是在組織上與功能上劃分文武部門，並且對於軍方政治中立性和專業自主性加以制度性的規範，來保障文人政治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從而抑制了文武集團間的衝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所謂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指導下所建立的軍隊，強調的是高度的軍事專業性和政治中立性，加上軍隊在結構上與社會其他部門分離自成一體，因此軍隊直接涉入非軍事領域活動的可能性也大為降低，除非這個國家遭遇到緊急的情況，軍隊在文人政府的指揮下介入社會危機或政治危機，以保障合法的權威，這種情形又另當別論。由於軍方在政治方面不捲入黨派之爭，因此軍隊也不可能成為內部派系鬥爭的奪權工具，軍隊完全國家化，這種超然的中立立場正是所謂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最大特色。

反過來看，中共自稱的無產階級軍事路線，也就是建軍初期，經過「三灣改編」和「古田會議」，所確立的一些基本原則，其後並逐步發展為一整套的建軍制度。歸納起來，這條路線包括了兩大原則：一是黨指揮槍，二是軍隊具有多種功能性。以黨領軍的原則並非由中共首創，彭德懷即指出說：「蘇聯軍隊是第一支在共產黨領導下建立起來

關於研究中共軍隊的幾個問題

的人民軍隊。蘇軍建設的基本經驗，是軍隊要置於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根據這些經驗建立起來的軍隊，是一切社會主義國家軍隊的榜樣。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同志就是在中國運用蘇軍建設紅軍的經驗，按照蘇軍的榜樣來建設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註四十五）在以黨領軍的原則上，中共師法蘇聯，雙方並無二致，都是由黨來控制軍隊，可是雙方採取的手段與方法，却不盡相同。（註四十六）至於在軍隊的角色功能方面，中共自建軍以來，軍隊不僅要執行軍事任務，而且也要執行非軍事性的政治任務，這種特色倒是蘇軍付諸厥如的。（註四十七）

值得注意的是，自中共稱兵後，當時的背景已轉變為漢庭頓所稱的「東方型革命」（Eastern Revolution）。（註四十八）所謂「東方型革命」指的是，先有新社群進入政治圈，並建立制度，然後舊秩序的政治制度被推翻。這種型態的革命，是從控制邊遠地區建立基地開始，經由恐怖和宣傳來獲得農民的支持，慢慢擴展其控制的範圍，並逐漸升高軍事活動：從個人的恐怖行動，游擊戰、運動戰以至正規作戰。最後再把力量集中到戰場上將政府軍擊敗，並佔領首都達到革命的目的。由「南昌暴動」到大陸淪陷為止，中共的武裝奪權活動的發展歷程，實具有「東方型革命」的特點。

詹遜（Chalmers Johnson）曾指出，運用武力來奪取政權的型態有二，一是迅雷不及掩耳的軍事政變，一是長期的游擊戰爭。前者是利用軍隊，對於執政者施加一場突然性、戰略性的攻擊，並且迅速攫奪政權。後者主要是經由一場持久的游擊戰和組織化的群眾運動，來對現存政權的合法權威和其軍警力量的有效性提出系統性的挑戰。游擊戰式的叛亂活動不僅需要組織一支機動性又具有多重功能性的軍隊，同時也需要建立武裝根據地，以便動員群眾來支持其叛亂活動，並且在必要給養方面維持自給自足。那麼如何才能獲得群眾的支持呢？以亞洲地區的革命戰爭為例，可以利用土地的重新分配來號召貧農，不過，通常最普遍而且最成功的方法乃是以保家衛土為號召，激發排外的民族主義情緒，來對抗國內所謂的叛徒和外國的侵略者。因為誰有獲得群眾積極的支持，群眾才會提供情報、嚮導、兵員及勞力，而游擊武力才能隱藏埋伏，避免掃蕩，並提高機動性。（註四十九）顯然，中共採取的武裝鬥爭活動正具有上述的特性，詹遜（Chalmers Johnson）將其稱之為軍事化的群眾叛亂戰（militarized mass insurrections）。詹遜指出毛澤東採取的軍事化的群眾叛亂戰具有五個條件：一動員支持的群眾，二組織已動員的群眾，三以黨員為核心建立一支大規模的革命軍隊，四採取適當的軍事戰術，五訴諸於持久戰。（註五〇）而高英茂教授認為，經由毛澤東所

發展出來的中共軍隊具有三大特色：一、多重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二、結構蕪散性（structural diffuseness），三、軍隊政治化（politicalization）。（註五十一）奧格森堡（Michel Oksenberg）也指出說：「毛澤東所締造的，是一支具有高度政治性，而且深深介入社會和經濟的軍隊。」（註五十二）事實上，中共軍隊不僅具有政治和軍事的特質，而且也具有多重功能性。換句話說，黨不僅要控制軍隊，而且也要動員軍隊執行非軍事性的政治任務，這正是中共軍事路線發展成型以來，所具有的最大特色，也是中共後來自詡的無產階級軍事路線。

中共首任國防部長彭德懷於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被黜後，在「廬山會議」上通過的決議批判彭說：「他的反黨活動，正是中國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企圖按照資產階級面貌來改造黨、改造軍隊、改造世界這樣一種階級鬥爭的反映。」（註五十三）這也是日後彭在國防部長任內所推動的一系列建軍政策被打成「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原委。「文革」爆發後，彭德懷被定罪如下：「黨廬山會議所揭露的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借著他們在軍隊竊據的重要職務，力圖取消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取消政治工作，取消地方武裝和民兵，從根本上否定毛主席的人民軍隊和人民戰爭的思想。他們妄圖按照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的軍事路線，改造我們的軍隊……」（註五十四）由此可見，所謂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就是否定黨指揮槍和軍隊具有多重功能性這兩大原則，這也就成為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區別所在。

四、正規化建軍與紅專衝突

自五〇年代以來，中共軍內曾發生數次重大的整肅事件，如「彭德懷事件」、「羅瑞卿事件」及「林彪事件」。這些事件牽涉到的不只是政策衝突的問題，而且也與內部派系鬥爭具有密切的關係。關於政策衝突的問題，自五〇年代後即一直存在。由於中共自建軍以來，兵源來自廣大的中國農村，就其本質而言仍是一支農民軍隊，其最大的特色即是保守性很強，「農民戰爭在發展過程中，特別是在取得了相當的勝利並建立自己的政權組織後，的確會出現一些封建化的現象。……，因此，這時農民革命隊伍不但要有一個發展壯大的軍事組織形式，而且新建立的政權組織也有一個採取什麼組織形式的問題。」（註五十五）因此，彭德懷在國防部長任內所推動的一系列建軍政策，即試圖建立一個高度集中和統一的正規化軍事體制，將全軍納入此一體制加以有效地控制和運作，然却引發軍內的衝突，約飛（Ellis Joffe）將其稱之為紅專衝突。（註五十六

關於研究中共軍隊的幾個問題

）而紅專衝突的概念也被一些學者用來解釋中共內部的衝突與矛盾。（註五十七）

關於紅與專的問題，毛澤東在「工作方法六十條」中曾指出說：「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是兩個對立的統一，一定要批判不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政治與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年年如此，永遠如此。這就是又紅又專。將來政治這個名詞還是會有的，但是內容變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於業務，那會成爲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爲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和統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爲一放鬆，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一定會走到邪路上去。」（註五十八）根據毛澤東的觀點，要達到「又紅又專」的理想，必須堅持「政治掛帥」、「思想掛帥」的原則。基本上，「紅」代表的是一種政治態度，一種思想立場，強調的是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及對共產黨的忠誠，爲了達成共產主義所揭櫫的理想，個人應具有自我犧牲的奉獻精神，獻身於共產主義的事業，至於在黨的整體利益下，個人更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而不計個人的利害與得失。（註五十九）爲了將這套特殊的價值觀念，灌輸於全黨、全軍、全民，毛澤東生前一直採取一種強制性的方式，來推動政治社會化，以塑造符合共產主義理想的政治人格。可是在實際運作方面，在不同的時期，「紅」却具有不同的涵義。在毛澤東生前，以是否忠於毛澤東及其思想爲標準。目前在鄧小平當權時期，又被轉換爲以是否支持鄧小平及其提出的政策爲標準。由於標準不一，詮釋不同，也就滋生事端，並在中共內部派系鬥爭中成爲政敵間互相攻擊的藉口。至於在軍隊中，軍事任務與非軍事性任務的比重問題，往往成爲軍內衝突的焦點，換句話說，到底是「突出軍事」重要呢？還是「突出政治」重要呢？筆者認爲，中共歷任國防部長均試圖在紅與專之間維持一種均衡態勢，這種構想落實到具體政策的層面，也就成爲政軍任務與訓練時間的分配比例上。事實上，要達到又紅又專的理想，並不是任務比重及時間分配的問題。「紅」必須是在長期的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所塑造出來的一種特殊的政治人格，「專」則注重於專業性知識的培養，學校的密集教育與訓練則是必要的。照說，紅專間應無衝突，並可加以調和。問題是，軍內衝突的產生，往往以任務的比重與時間的分配爲導火線，這就演成所謂的紅專衝突。

至於，「專」的基本涵義，筆者認爲可以分爲三個層面來探討，一是專業性（*expertise*）二是專業主義（*professionalism*），三是專業化（*professionalization*），三者涵義不同却具有關聯性。就中共所指涉的「專」的意義而言，應只是專

業性，而非專業主義。專業性指的是具有專門的科學技術及知識，專業主義指的是每個行業所具有的特殊態度。漢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指出說：「就一個特殊的行業而言，職業具有的明顯特徵是專業性（expertise），責任（responsibility）和團隊精神（corporateness）。」（註六〇）換句話說，不同職業的人固具有不同的團體意識和感覺，並對本身的職業具有一種責任感，這種特殊的態度也就是專業主義。因此，愈具有專業性的行業愈容易產生專業主義。至於專業化則包括了專業性和專業主義兩種成份（註六十一），因此專業化的程度愈高，專業自主性（professional autonomy）的程度也就愈高，也就是對於本身的專業領域將有一種高度的敬業精神，這種精神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對於外來的非專業性的干涉或干擾將會產生一種強烈的排斥作用，另一方面基於本身的專業性也不會干涉或干擾非本身專業的領域。

基於以上的分析，紅專衝突的概念是否可以用來解釋中共軍內的衝突呢？薛爾曼（Franz Schurmann）認為不能以紅專衝突的概念來解釋中共軍內的衝突，薛爾曼指出：「在『文革』期間披露的大批文件資料顯示，紅與專的字眼幾乎從未出現過。彭德懷被猛烈抨擊的原因是因為試圖篡黨篡軍，而不是主張『專』（expertise）。」（註六十二）關於「彭德懷事件」薛爾曼指出，不僅毛澤東反對彭德懷，而且劉伯承、葉劍英及粟裕這批職業軍人也對彭德懷不滿。（註六十三）必須指出的是，彭德懷與劉伯承、葉劍英、粟裕等人發生爭論的焦點，只是國防現代化是否應列為第一優先的項目，也就是軍費應佔多少比例的問題。彭德懷認為中共既與蘇聯結成同盟，中共就無迫切必要將有限的資金挪用於武器現代化的研究發展或生產。反之，劉伯承、葉劍英及粟裕等人主張唯有快速推動武器現代化，加強軍事備戰，才能對抗美國對中共發動的突然攻擊。因此，日後彭德懷乃被抨擊為：「他把我軍裝備的改善和尖端科學技術的發展，完全依附於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妄圖使我軍成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附庸。完全無視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需要和祖國的安全。」（註六十四）雖然，彭德懷與劉伯承、葉劍英、粟裕等人在政策主張方面有衝突，可是，劉伯承、葉劍英、粟裕並不反對彭德懷推動的正規化建軍。因為國防現代化包括了兩個層面，一是武器裝備現代化，二是人員現代化。換句話說，現代化的武器必須由現代化的人來掌握使用。因此，就必須提高全軍專業性水準，而彭德懷推動的正規化建軍目標之一，就是利用軍事院校培養學有專長的職業軍官，來促進全軍的專業性。在這方面的努力，劉伯承、葉劍英及粟裕等人應無異議。問題是，隨著全軍專業性水準的提高，而產生了專業主義精神

關於研究中共軍隊的幾個問題

，又促使共軍走上更專業化的道路，毛澤東認為，這種發展趨勢將有違共軍的「革命傳統」、「光榮傳統」，並背棄了傳統的「建軍精神」，這才是毛澤東對於彭德懷不滿的起因。

雖然，彭德懷在國防部長任內，大力培養具有專業主義精神的職業軍官，力圖將全軍全面正規化，並極力避免將軍隊用於非軍事性的任務；但是，就彭德懷本身在「廬山會議」上提出抨擊「三面紅旗」的「意見書」而言，彭的作法並不符合專業主義精神。換句話說，當時彭德懷是「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長，主管的業務是軍事而非經濟，因此彭的作風無異具有軍人干政的味道。雖然，日後鄧小平宣稱說：「彭德懷同志……作爲政治局委員，向政治局主席寫信，也是正常的。」（註六十五）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這只不過是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手段而已，以突出彭德懷的清官形象來譏貶毛澤東。如果，彭德懷上「意見書」的作法是正確的話，那麼，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也就無可厚非了。一般學者均忽略了彭德懷上「意見書」之舉，可以說是開了中共建立政權後軍人干政的先例。

事實上，軍人干政的現象在第三世界的新興國家中實甚爲普遍。可以了解的是，軍人的工作一直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甚可能產生一種傾向，輕易地認爲只要以命令貫徹的方式，一切難題均可迎刃而解，而往往忽視產生問題的複雜背景。加之，第三世界中新興國家的軍人都具有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對於社會問題特別敏感，江炳倫教授即指出說：「……軍人對本國的弱點特別敏感，時想辦法趕快彌補改善。」（註六十六）尤其是新獨立的國家，政治機構在運作上顯得微弱又無能之際，軍事統治乃隨運而生。甚至，軍事政變也層出不窮，據估計，單在六〇年代，第三世界中所爆發的軍事政變就超過兩百次以上。（註六十八）同樣的，中共軍人對於時局的不滿亦具體表現出來。「文革」爆發後，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事件，即是一批老師、老軍頭對於此一運動不滿的具體反應。接著，在同年七月間又爆發了「武漢兵變」事件。此一事件顯示，軍方不僅對於「文革」極端不滿，同時對於激進文人企圖染指軍權的反應也非常激烈。基本上，軍隊本身是個團隊組織體（a corporate body），因爲要求內部凝爲一體，以建立一種統一的團隊認知感（a unique corporate identity），而排除外來的政治操縱（political manipulation）。（註六十九）鑑於軍方的強烈反應，毛澤東指示說：「不要把我們的軍隊搞亂了，解放軍內部有問題可以一個省一個省的來談判。不要把黨內一小撮走資派和軍內一小撮走資派並提，只提黨內一小撮，把解

放軍搞好。」（註七十）與此同時，又頒佈了「九·五命令」，授權共軍可以運用武力進行「自衛反擊」。（註七十一）此一命令促使地方軍頭採取武力鎮壓造反派群眾，並趁機打擊敵對派系，而使軍方在地方上大權獨攬，形成軍事統治的局面。由此可見，毛澤東對軍方亦禮讓三分。而軍人在中共政壇上也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不僅具有決策發言權，而且在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的關鍵時期成爲舉足輕重的力量，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及一九七六年「十、六政變」即爲兩個最有名的事例。雖然，中共軍隊內部山頭林立，派系複雜；但是站在軍方的立場，無疑已形成一種特殊的壓力團體，促使決策部門不敢輕視軍方所提出的政策主張。

五、黨軍關係與軍人干政

必須指出的是，軍方形成一權獨大的強勢地位，並直接干涉地方黨政，實肇因於「文革」期間的「三支兩軍」。「文革」前，在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內，軍方雖擁有決策影響力，但並未在地方形成干政的現象。至於中共統治大陸初期，設置「六大軍政委員會」，實施軍事統治，主要是採取高壓的手段清除反共份子，以鞏固政權。迄至彭德懷推動正規化建軍期間，地方軍區即甚少介入地方黨政事務，當時鄧小平亦批評說：「軍隊同地方黨政聯繫不夠」（註七十二）。雖然，此時共軍實行雙重領導制，也就是除了軍事指揮系統外，地方駐軍必須接受地方黨委的領導與監督，例如省委第一書記通常兼任大軍區或省軍區的第一政委或政委。不過，地方黨委也甚少干涉軍方內部事務，因此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一月間提出的「工作方法六十條」之中，曾指示：「黨委要抓軍事，軍隊必須放在黨委的領導和監督之下，現在基本上也正是這樣作的。這是我軍的優良傳統。作軍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黨委抓這項工作的。只是因爲忙於社會改革和經濟建設工作，近幾年來我們抓得少了一些。現在應當改善這種情況。辦法也是一年抓幾次。」（註七十三）可是，地方黨委似乎也不願介入軍方的內部事務，因此在一九六四年期間，毛澤東批評說：「你們省委第一書記都是政委，多少年不履行職務，只是空頭政委，不抓軍事……」（註七十四）當時，毛澤東已發動「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運動，並在黨政機構、工廠、企業及學校內仿效共軍設立政工部門，結果軍方的勢力反而擴散至地方的各級機構內，但並未形成軍人干政的現象。（註七十五）「文革」爆發後，由於地方黨政機構均告癱瘓，整個局勢已失去控制之時，毛澤東、林彪才下令共軍「支左」，軍隊乃正式介入「文革」。關於共軍被動地捲入「文革」，並進而掌

關於研究中共軍隊的幾個問題

握地方黨政大權，形成軍人干政的現象，這種型態確實在第三世界中是罕見其例。（註七十六）高英茂教授及張旭成教授均引用詹諾維茲（Morris Janowitz）所提出的反應式軍事主義（Reactive Militarism）的概念，將共軍介入「文革」的型態歸類為反應式軍事主義。（註七十七）所謂反應式軍事主義指的是，由於文人機構的軟弱無能而導致軍權的擴張，也就是軍人干政是出自文人主要執政者的要求。（註七十八）換句話說，文人政府無能為力來處理社會危機，唯有動用軍隊來應付危機，結果往往演變成軍事鎮壓和軍事管制的局面，而形成軍人干政的現象。不過，約飛（Ellis Joffe）反對將共軍介入「文革」歸類為反應式軍事主義。（註七十九）事實上，並非是文人政府的軟弱無能而產生危機，「文革」初期，劉少奇、鄧小平曾派遣工作組，採取高壓手段控制運動的發展，顯示當時中共當局仍具有處理危機的能力與決心。不過，毛澤東却鼓動紅衛兵砸爛黨政機構，反而擴大了危機，而形成共軍執行「三支兩軍」任務的背景，並導致軍方掌握地方黨政大權，形成一權獨大的局面。這也是約飛認為不能引用反應式軍事主義的概念，來解釋共軍介入「文革」並進而干政的型態。

基本上，中共軍方具有強勢的政治地位，亦不可忽視中共崛起的背景。由於中共係「馬上得天下」，因此不少高級軍頭自認為是「開國元勳」，恃功而驕也是必然的，這批軍頭就是中共的第一代職業軍人。惠特森（William W. Whitson）根據政治危機（political crisis）、軍事倫理（military ethic）及軍事型態（military style）等三項標準，將中共職業軍人區分為十一個世代。（註八十）波莫特（Amos Perlmutter）則將惠特森提出的十一個世代濃縮為三個世代。（註八十一）白魯恂則根據經驗理論（Experiential Theory），將中共政治領袖區分為五個世代，「長征世代」（the Long March generation），「抗戰世代」（the Japanese War generation），「內戰世代」（the Civil war generation），「解放後世代」（the post-Liberation generation）及「文革世代」（the Cultural Revolution generation）等。（註八十二）所謂「長征世代」，也就是中共自稱的「長征幹部」。在一九六二年時，毛澤東曾透露說：「我們現在有一千七百多萬黨員，這裡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國以後入黨的，五十年代入黨的。建國以前入黨的只佔百分之二十，在這百分之二十的人裡面，一九三〇年以前入黨的，二十年代入黨的，據前八年計算有八百多人，這兩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註八十三）換句話說，一九四九年中共建立政權時，統治中國大陸的是一

批約八百人的領導集團，這批精英份子俱屬「長征世代」，也就是「長征幹部」。這批人大多數具有軍隊背景，不少人且擁有文武雙重身份。由於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這批人均曾立下所謂「汗馬功勞」，而被視為「革命功臣」。一九四九年後，這批人自然就成為中共黨政軍的高層領導幹部，其中又以具有軍人背景者最具影響力，也就是第一代職業軍人具有最強勢的政治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從一九五六年的「八大」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三大」，歷屆「政治局」中的職業軍人清一色均出身於「長征世代」。換句話說，自五〇年代至今，「政治局」內的職業軍人始終沒有出現過世代交替的現象。目前在「政治局」內的兩名職業軍人，楊尚昆及秦基偉也都是「長征幹部」，類似的情形也存在於「中共軍委」內。「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及副秘書長洪學智、劉華清等人，這批掌握共軍最高指揮權的實力軍頭均是第一代職業軍人。顯然，由毛澤東至鄧小平時期，「中央軍委」內軍權的轉移仍是同代交班，而非世代交替。

事實上，中共第一代職業軍人也一直把持槍桿子不放，因而造成第二代，第三代的職業軍人無法按步接班，這種現象早在毛澤東生前即已存在。當「四人幫」當令期間，在毛刻意培植下，造反派工人王洪文出任「中央軍委」副主席，激進文人張春橋則出任「中央軍委」常委兼「總政治部」主任，王、張不僅與軍方淵源不深，而且也無彪炳戰功，論資排輩的話，正係「文革世代」，張則屬「抗戰世代」，根本遠不如這批自命為「開國功勳」的第一代職業軍人。正由於「四人幫」無法獲得第一代職業軍人的支持，因此根本無法掌握槍桿子，這也是日後「四人幫」事敗的關鍵所在。

迄至毛澤東死後不久，「四人幫」隨即在第一代職業軍人所策劃的一場宮庭政變中被捕入獄，接著由華國鋒粉墨登場，出任黨主席兼「中央軍委」主席。問題是，華與「四人幫」一樣，不僅缺乏軍隊背景，而且「革命」資歷也不如第一代職業軍人，華也壓不住這些老軍頭，最後唯有黯然下台。再以鄧小平一手拔擢的接班人胡耀邦為例，胡雖係出身長征世代的老幹部，然而和軍方的關係不夠，在第一代職業軍人的抵制下，胡始終無法出任「中央軍委」主席，反而在這批老軍頭的逼宮下，步上華國鋒的後塵。

非常明顯的是，迄至「十三大」為止，第一代職業軍人仍緊抓「中央軍委」的實權。值得注意的發展是。「十三大」後不久，中共又大幅改組了軍方高層領導班子，史無前例地一舉更換了三大總部的首長，緊接著又陸續調整了一級軍區的軍政首長及海軍司令員，這批軍事新貴包括了：「總參謀長」遲浩田，「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總後

關於研究中共軍隊的幾個問題

勤部」部長趙南起，「北京軍區」司令員閻衣冰，政委劉振華，「瀋陽軍區」政委宋克遼，「廣州軍區」司令員張萬年，「濟南軍區」政委宋清渭，「成都軍區」司令員張太恒及海軍司令員張連忠。這批新上任的當權軍頭，最大的特色就是平均年齡在六十歲左右，也就是介於「抗戰世代」及「內戰世代」之間的職業軍人。換句話說，第二代、第三代職業軍人已開始掌握由三大總部，兩大軍總（海軍及空軍）到各大軍區的軍權。

基本上，按照鄧小平在「十三大」所做的撥亂部署，趙紫陽以「政治局」常委兼總書記的身份，又再出任「中央常委」第一副主席。顯然，鄧的打算是在他死後由趙理所當然地升任為「中央軍委」主席。可是，趙本身缺乏軍事資歷，與軍方的淵源甚至還不如胡耀邦，很難駕馭軍方。因此，鄧採取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安排楊尚昆及秦基偉續留「政治局」內，以襄助趙處理軍務；另一方面拔擢第二代、第三代資淺年輕軍頭出掌三大總部，兩大軍總及各大軍區的軍權，以免第一代資深年老軍頭把持槓桿子，而肇致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後患。

站在鄧小平的立場，鄧當然不希望他死後再重蹈毛澤東的覆轍。因此在「十三大」上，鄧主動退出「政治局」，以逼退陳雲、李先念及彭真這些元老幹部；部分保守軍頭則轉入「中央顧問委員會」，僅留下兩名擁鄧軍頭—楊尚昆及秦基偉，起碼目前軍方很難在「政治局」內興風作浪，而對決策產生不必費的困擾。非常明顯的是，鄧小平的目的就是儘量壓縮軍方在「政治局」內的影響力。

問題是，由「十三大」以來，鄧小平本人的急切作風已產生一些無法避免的後遺症。首先就是，鄧爲了擺平黨內派系矛盾，不惜一手破壞他一直試圖建立的制度，爲了選就他本人續任「中央軍委」主席，而刻意修改黨章，創下中共黨史上未有的先例，首度出現「中央軍委」主席既非「政治局」常委，亦非「政治局」委員。至於在黨的組織結構上，「中央軍委」無疑已與「中央委員會」，「中央顧問委員會」並駕齊驅，形成三權鼎立的現象。趙紫陽雖爲「政治局」常委及「書記處」總書記，然却屈居鄧小平之下，擔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實質上已貶低了「政治局」及「書記處」地位。反之，鄧卻可以「中央軍委」主席之尊發號施令，不僅重開槍指導黨的惡例，而且也埋下未來軍方干政的種子。

當然，鄧小平在其生前或許可以鎮撫軍內的不滿勢力，這種現象正如同毛澤東晚年一樣。可是毛死後屍骨未寒，軍方即介入一場宮庭政變，以毛末亡人江青爲首的「四人幫」……被捕入獄，此一事件證明擁毛軍頭未必擁江。同樣地，擁鄧軍頭是否也擁趙呢？更何況，鄧小平重新得勢新政後，却一再逼退曾經力保他復出掌權的老幹部與老軍頭

，鄧這種卸磨殺驢的作風，早已引起黨內的非議和軍內的不平，而成爲趙紫陽未來接班的最大隱憂。尤其不可忽視的是，中共始終無法將政治繼承納入制度的規範，而鄧又再三以削足適履的方式來牽就他個人的權位安排，因此未來中共政權能否可以順利地和平轉移，恐怕仍有疑問。

註 釋

註一：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毛澤東選集」（全本），（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七年），頁五〇九。

註二：「人民日報」，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

註三：Karl Marx,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Selected Works in Two Volumes, VOL.1 (Moscow: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1958), p.44.
House, 1958), p.44 .

註四：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一冊。（台北：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暨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民國六十二年九月增訂版），頁二。

註五：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頁一三四。

註六：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264-274.
264 ~ 274 .

註七：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香港：龍門書店，一九六八年一月影版），頁一三七～一四二。

註八：馮建輝，「建黨初期的陳獨秀」（原載「歷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收錄於朱成甲編，「中共黨史研究論文選」上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頁七一～七二。

註九：同註八，頁七三。

註十：斯諾，「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關於自己的革命經歷和紅軍長征的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第一版），頁四二。

註十一：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上卷，（香港：明報月刊社，一九七八年五月初版

關於研究中共軍隊的幾個問題

），頁二四～二五。

註十二：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頁一三～四六。

註十三：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澤東選集」（全本），頁八〇八。

註十四：James P. Harrison, *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 A Study in the Re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ATHENEUM, 1969), p.52.

註十五：同註十，頁四四，四六。

註十六：同註十二。

註十七：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澤東選集」（全本），頁五八八。

註十八：Samuel P. Huntington. *op. cit.*, p.270.

註十九：翁之鏞，「中國經濟問題探原」，（台北：正中書局，民國四十五年十一月台二版），頁九四。

註二〇：蔡雪村，「中國歷史上的農民戰爭」，（上海：亞東圖書館，民國二十二年四月），頁一一一。

註廿一：同註二〇，頁一五〇。

註廿二：同註二〇，頁一一二。

註廿三：馬札亞爾者，陳代青，彭桂秋合譯，「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上海：神州國光社，民國二十三年八月三版），頁四〇四。

註廿四：同註十一，頁二七～三八。

註廿五：龔楚，「龔楚將軍回憶錄」下卷，（香港：明報出版社，一九七八年五月初版），頁四九三。

註廿六：毛澤東，「同法國事務部長馬爾羅的談話」（一九六五年八月三日），「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頁六一七。

註廿七：同註十，頁七八。

註廿八：同註十，頁七八。

註廿九：劉少奇，「論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劉少奇選集」上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十二月第一版），頁三一四～三七〇。

註三〇：Ying-Mao Kau, *Urban and Rural Strategi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John Wilson Levis, ed., *Peasant Rebellion &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253-270.

註卅一：Harold Isaacs,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ndon: Sacker and Warbury, 1938), p.404.

註卅二：同註二〇，頁八八。

註卅三：「中共黨史主要事件簡介」（一九四九～一九八一），（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頁一五。

註卅四：在一九八〇年九月之前，也就是中共在農村全面推行生產責任制前，中國大陸農村經濟實瀕於崩潰的邊緣，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五日「人民日報」列出署名吳象的長文「陽關道與獨木橋——談談包產到戶的由來、利弊、性質和前景」即透露：「今年夏季，據全國五〇四萬個農村核算單位統計，每人平均收入一百元以上的不到百分之廿五，五十元以上的佔百分之廿七點三，其餘百分之五十左右在五十元到一百元之間，一部份很窮的生產隊中最窮的，連溫飽問題也不能解決，簡單再生產也很難維持，經常過著『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日子，集體經濟辦不好，形成了惡性循環。在這種惡性循環中掙扎的農業人口，達到一億左右。」另以廣東珠江三角洲的富庶地區為例，在一九七九年時，當地的農村經濟還不如一九四九年之前，See Steven W. Mosher, *Broken Eart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A Division of Macmillan, Inc., 1983), pp.301-307.

註卅五：同註二〇，頁九四。

註卅六：同註十九，頁九七～九八。

註卅七：同註十一，頁二一五～二一六。

註卅八：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199.

註卅九：王希哲，「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香港「七十年代」，一九八一年二月號，頁二六～四七。

註四〇：周恩來，「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一九四九年

關於研究中共軍隊的幾個問題

七月六日），中國問題研究中心編輯，「周恩來專輯」上册，（香港：白聯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十月初版），頁一八一。

註四一：毛澤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第一卷，頁八七～八九。

註四二：同註四一。

註四三：林希翎，「致鄧小平同志的信」（一九八〇年六月），香港「廣角鏡」月刊，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六日，一三二期，頁二六～三六。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特點是，土地國有，國家是最高地主，向全省的生產者—農民徵收租稅，國家以農民的租稅養活一大批官僚，所以官僚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國家裡和地主、資本家一樣，屬於剝削階級。義大利學者Umberto Melotti 認為中共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典型。See Umberto Melotti, *Marx and The Third World*, Pat Ransford trans. (London and Basingstoke: The Macmillan Press, 1977), pp.105-113.

註四四：Samua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pp.83-85.

註四五：「人民日報」，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註四六：Jonathan R. Adelman, *The Revolutionary Armi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Soviet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ies* (West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Press, 1980), pp.133-143.

註四七：Ibid, pp.153-174.

註四八：Samuel 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264-274.

註四九：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ary Change* (Second Edition)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136-151.

註五〇：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 (Stanford, California: 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1964), pp.57-60.

註五一：Ying-Mao Kau,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China's Nation Building* (White Plains, N. 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3), Introduction.

註五二：Michel OKsenberg, *Mao's Policy Commitments, 1921-1976, Problems of Com-*

munism, VOL.XXV, NO.6 (November-December 1973), p.15.

註五三：「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事件的決議」（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註五四：「解放軍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

註五五：「光明日報」，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七日。

註五六：Ellis Joffe, *Party and Army: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al Control in the Chinese Officer Corps, 1949-196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67), p.156.

註五七：A. Doak Barnett, *China After Mao*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26-34; also see Martin K. Whyte "Red vs. Expert": Peking's Changing Policy,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XXI, NO.6, (November-December 1972), pp.18-27.

註五八：毛澤東，「工作方法六十條」（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丁望主編，「『毛澤東選集』補遺」（第三卷）（一九四九～一九五九），（香港：明報月刊社，一九七一年），頁一六四～一七九。

註五九：A. Doak Barnett, *op.cit.*, p.26; and Franz Schurmann, *op.cit.*, p.52.

註六〇：Samuel P. Huntington, *The Soldier and The State*, p.8.

註六一：Paul H. B. Godwin, *Profess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Armed Forces: A Reconceptualization*, Dale R. Herspring and Ivan Volgyer, *Civil-Military Relations in Communist System*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78), p.221.

註六二：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nd edition, enlarged, 1968), p.564.

註六三：Ibid.

註六四：「人民日報」，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七日。

註六五：鄧小平，「對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一九八〇年三月～一九八一年六月），「鄧小平文選」，（香港：三聯書店，一九八四年九月），頁二五九。

註六六：江炳倫：「談軍人與政治發展」，載於「政治學論叢」，（台北：華欣文化事業中心，民國六十四年三月），頁四四。

關於研究中共軍隊的幾個問題

- 註六七：Edward Shils, "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tates", in John J. Johnson. ed.,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8-9.
- 註六八：Gavin Kennedy, *The Military in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4), p.14.
- 註六九：Amos Perlmutter & Valerie Plave Bennett, *The Political Influence of the Milita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8.
- 註七〇：毛澤東，「十八項指示」，（一九六七年八月至九月），「中共機密文件彙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輯印，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四月初版），頁二三。
- 註七一：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華」，「關於不准搶奪人民解放軍武器裝備和各種物資的命令」（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中共文化大革命重要文件彙編」，（台北：「中共研究」雜誌社，民國六十二年四月），頁七七～七九。
- 註七二：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擴大的全體會議上），「中共黨史參考資料」內，（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一月），頁六五七。
- 註七三：同註五八。
- 註七四：毛澤東，「關於軍事工作落實和培養革命接班人的講話」（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頁五〇〇。
- 註七五：「人民日報」，一九六四年二月一日，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
- 註七六：See S.E. Finer, *The Man on Horseback: The Role of the Military in Politic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 1962).
- 註七七：Ying-Mao Kan, *op.cit.* Introduction. xlviii-xlvix.
- 註七八：Morris Janowitz, *The Military in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New Nation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pp.85-86.
- 註七九：Ellis Joffe, *The Political Pole of the Chinese Army: Overview and Evaluation*, Yu-Ming Shaw, ed., *Power and Policy in the PRC* (Boulder, London: Westview Press, 1985), p.167.
- 註八〇：William W. Whitson, *The Chinese High Command: A History of Communist*

Military Politics, 1927-71 (New York, Washington, London: Praeger Publishers, 1973), pp.416-435.

註八一：Amos Perlmutter,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Tim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1977), pp.243-244.

註八二：Lucian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Publishers, Inc., 1981), p.101.

註八三：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頁四一七。